

论人类文明视域中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兼论中华文明背景中的“中国模式”建设之道 耿有权

(东南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所, 江苏 南京 210096)

[摘要] 大学是体现人类文明的一种文化机构,应当放之于人类文明的大视角中加以认识,并作为国家文明战略的组成部分加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早期是多种文明综合性发展的自然结果,历史性地“耦合”欧洲文明生态体系;是人类文明互动发展促成了“欧洲模式世界一流大学”的成功,并演化为有国别特色的建设模式,其中20世纪前后以“美国模式”为主导。21世纪,中国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则必须紧抓机遇,以和而不同、科学发展、人民满意、特色发展、内涵发展、借鉴发展的精神理念来推进有中华文明特色的“中国模式”建设。

[关键词] 人类文明;世界一流大学;中国模式

[中图分类号] G64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511X(2010)03-0110-07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指出:“在一个时间和空间均已统一的世界,对人类事务的研究若想取得成效的话,就必须从广阔的视角入手。”^{[1]23}在人类文明史上,大学的诞生是一个奇迹,也是人类最具深远意义的伟大创造。从柏拉图学园到中世纪大学诞生,直到如今众多一流大学全球互竞发展的局面,都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大学追求进步的客观表现,也是大学自然发展的重要体现。站在人类文明大视角看,世界一流大学有其独特的演变规律和发展轨迹,其萌芽、诞生、成长、形成、革新、发展,不仅是一个受各种客观因素制约或影响的事物演变过程,而且是一个受人类主观能动性影响的发展过程。作为人类文化机构,世界一流大学早期是多种文明综合性发展的结果,历史性地“耦合”欧洲文明生态体系;是人类文明持续互动性发展促成了“欧洲模式世界一流大学”的成功,并演化为具有国别特色的建设模式,如英国模式、德国模式、美国模式等,其中20—21世纪“美国模式”占据全球主导地位。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人热切期待“中国模式世界一流大学”创建成功,有关行动计划为世界各国关注。确实,21世纪中国创建一流大学的历史进程不可阻挡。但是,若要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杰出的贡献,则必须紧抓历史机遇,以先进的精神理念加速推进具有中华文明特色的“中国模式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这不仅是全球化时代的

召唤,而且是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任务。

一、人类文明进程中世界一流大学发展脉络

环视全球,绝大多数世界一流大学处于欧美文明体系特别是美国文明中。这是一个客观事实。用哲学家黑格尔的观点来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才能存在,那么可以说,世界一流大学作为人类文明进程中的“特殊事物”,也遵循了这样的存在规律。

(一)多种文明为一流大学“胚胎孕育”做出贡献

任何世界一流大学都属于某个文明,同时是世界文明中的一分子,要认识它,也只能放在具体的文明或文化中。人类文明或文化究竟有多少?据哈佛大学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教授考察,世界上至少有12种主要文明,其中7种文明已不复存在,5种文明依然存在,后者分别是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另外还有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2]28-30}。其中,中华文明历史最悠久且从未中断过。又据2001年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多种文化的星球》分析,世界主要文化有8种文化,即欧洲文化、北美洲文化、拉丁美洲文化与加勒比地区文化、阿拉伯文化、非洲文化、俄罗斯文化和东欧文化、印度和南亚文化、中国和东亚文化(包括日本文化和其它东亚文化)^{[3]1-3}。虽然该书讨论的是“文化”,但

[收稿日期] 2010-01-04

[基金项目] 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重点课题“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国模式’构建研究”(B-1b/2009/01/002)、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研究型大学在‘两个率先’战略中的贡献研究”(07SJD88006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耿有权(1967-),男,安徽全椒人,博士,东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学与教育伦理学。

由于“文明是放大的文化”^{[2]24-25}，因而，我们可将其视为对人类地球上各种文明的一种深入探讨。于此，我们见识到了世界文明的多样性。联系到世界一流大学，不难理解，它是处于多种文明或多种文化的人类环境中，事实上，站在人类文明进程的角度看，世界一流大学早期可以说是多种文明综合性发展的“自然结果”。关于这一点，已有的研究结论可以为“据”。如果说，哈佛大学中世纪史学家哈斯金斯(C. H. Haskins)在《大学的兴起》中的结论说明了西方文明的贡献，即“20世纪的大学是中世纪巴黎大学和(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的直系后裔；它们是我们现代大学被砍砸打磨出来的那块岩石；它们是我们现代大学被挖掘梳理出来的那条壕沟”^{[4]2}，那么，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其巨著《历史研究》中的推论则反映了非西方文明的影响，即“西方文明与东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伊斯兰文明和东正教文明也根植在同样的‘希腊-叙利亚文化复合资料’之上”^{[1]50}。更重要的是，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对西方世界一流大学的诞生做出了重大贡献，其中亨廷顿的结论则表明了非西方文明对西方宗教的客观影响，他说：“西方从未产生过一个主要的宗教。世界上的伟大宗教(含基督教)无不是非西方文明的产物，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先于西方文明产生的。”^{[2]40}他还说：“文明的内涵和外延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各民族的文化既相互作用又相互重合。”^{[2]27}据此，我们推论说，一流大学的“胚胎”客观上孕育于多种文明提供的“营养环境”中，或者说，是多种文明供给的“营养体系”中孕育出来的“间接性产物”。这个根源性和起始性说明了一流大学具有全人类性。

(二) 一流大学历史性“耦合”欧洲文明生态体系

大学史告诉人们，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诞生在欧洲，而后扩展到全世界。应当说，这是比较成熟的观点。我们注意到，曾任德国法兰克大学校长的瓦尔特·吕埃格(Walter Rüegg)在其著《欧洲大学史》中坚持认为：大学是欧洲的机构，而且确实是欧洲最卓越的机构。各种理由都可以支持这个结论。作为教师和学生的共同体，大学被赋予某些权利，……它是中世纪欧洲——基督教教皇统治的欧洲——的创造物。而且，大学是欧洲唯一在历史过程中始终保持其基本模式和社会功能与作用的机构。在他看来，没有其他欧洲的机构能像欧洲大学的传统形式那样扩展到整个世界，因为，欧洲大学所授予的学位——学士学位、资格证书、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的教育模式已被全世界大多数不同的社会所采用。确实，“四个中世纪学院——文学院(它有不同称呼，

如哲学、文学、艺术与科学、人文学院)、医学院、法学院和神学院保存至今，并且一直得到许多学科(特别是社会科学和技术科学)的充实。在全世界，它们依然是大学的核心。”^{[5]8-9}实际上，现代学者也认定，现代大学诞生于11世纪的欧洲，如世界上最古老大学是建于1087年的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其次，美国加州大学前校长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在看到欧洲大学稳定性的同时也注意到其变革性特征，“除了变革以外，没有什么是持久的。”“关于历史上的大学，可以说，其他一切都变化，但大学多半是持久的。西方世界在1520年前建立的大约75个公共机构仍旧以可辨认的形式存在，有着类似的功能和未中断的历史，包括天主教会。……以及61所左右的大学。”而且，“这61所大学大部分仍在同样的地点，拥有一些同样的校舍，教授和学生从事很相同的事情，学校管理按基本相同的方法进行。”^{[6]50}据专家研究，欧洲中世纪建立的大学中有70%至今仍是世界知名大学，有16%位于当今世界一流大学行列^[7]。这不仅说明了大学的坚韧性、传承性和可持续性，而且反映了大学与欧洲文明的深度切合性。关于这一点，美国丹佛大学埃里克·古尔德(Eric Gould)教授说得透彻，他说，美国“高等教育院校实际上就是一个资本主义企业。”^{[8]5}“大学对社会最为重要，因为，大学要为后代复制美国式的生活，还要用适当的精力来研究和保持自由资本主义，并且是在市场导向的文化中做这些工作。”^{[8]6}这句话真切道出了美国大学的人文本性与制度特性。据上海交大公布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2007年版”的报告，世界500强大学中绝大多数是信仰基督教文明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大学；以美国为首的20个高度发达的创新型国家、地区聚集了世界80%以上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9]50-51}。从这个角度说，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中，当今世界一流大学在制度设计、内部构造、人文品格等方面都匹配于欧洲文明生态体系。

(三) “欧洲模式世界一流大学”孕生了多种模式

世界一流大学在“欧洲模式”中充分体现了大学的人文特性，但同时也受到各种环境因素的巨大挑战，变得难以适应形势，因此必须加以改变。从历史进程看，中世纪—文艺复兴时代，大学在欧洲(特别是意法英德等国)孕育、诞生、推动、变化、发展。至19世纪，首先在英国获得突破，然后在德国获得重大发展，再到美国大学获得更自由的发展，其间，日本、俄罗斯等国相继诞生了若干所著名大学。于此，从世界一流大学的“历史路线图”看，欧洲模式世界一流大学实际上可以分为几种“子模式”，即“意大利

古典模式”及“法国古典模式”、其次是“英国模式”、“德国模式”以及之后的“美国模式”，还有“日本模式”等。具体说，学者们比较认同世界上最古老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是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起初是“学生型大学”，接着是肇始于1208年的法国巴黎大学，其开始是“教师型大学”。据历史记录：1300年前，巴黎大学设立了14所世俗性质的学院，14世纪大约设立了36所，15世纪设立了12所。可见，“法国模式”属于典型的大学院制^{[10]21-22}。我们知道，欧洲1990年代制定的高等教育纲领性文件——推进欧洲高等教育博洛尼亚进程文件，就是以“博洛尼亚”来命名的，说明了“意大利古典模式”的历史意义。至于“英国模式”，英国红衣主教约翰·亨利·纽曼(John Henry Newman)在《大学的理念》中阐述的是以教学功能为主导的大学模式，如模仿巴黎大学而诞生的牛津大学等；而以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为代表的大学理念催生了“德国模式”，如成立于1810年、号称“现代大学之父”的“洪堡大学模式”，这种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倡导“学术自由”及“教学与研究相统一”的大学理念。19世纪中叶以来，美国大学发扬其“西部牛仔式”的开拓精神，引入市场竞争理念，并将欧洲大学缺少的“社会服务”功能和理念发挥到极致，从而造就了自由、开放、竞争的“美国模式”，如哈佛大学等起初是从欧洲引进办学模式，后来循自我发展特色，独创一片天地，至今为世界大学所景仰。其间，美国诞生了众多世界一流大学。同时，日本、俄罗斯、印度、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也加强学习，使自身的大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不仅壮大了本国和本地区的教育实力，而且也促进了当地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的发展。

(四)“美国模式世界一流大学”被各国效仿

20世纪以来，世界一流大学在美国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虽然欧洲地区仍保持着强大的高等教育势力，但相对于美国高等教育，则落后了许多年。仅从规模上看，全球一万多所大学中，美国大学就占据了三分之一。美国现有4000多所大学。质量上，据美国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的统计数据，1994年美国就有236所研究型大学，到2005年发展到283所研究型大学，这个数字在美国整个高等教育系统中所占比例均在6%以上^①。又据上海交大发布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2007版”的报告，美国进入世界前500名著名大学的就有166所，处于前400名的有14所，前300名的有117所，前200名的有88所，

前100名的有54所，前50名的有37所，前20名的有17所^{[9]51}。可见，“美国模式世界一流大学”占据了全球世界一流大学数量之最。其巨大成就为世界各国所羡慕，并引来众多的包括中国在内的“学习模仿国”。近年来，世界各国包括相对保守的欧洲国家的著名大学相继进行了高等教育改革，推出了模仿美国一流大学的政策及做法，包括建设模式上的效仿和更新，其政策特征是加强高等教育竞争性、提高一流大学引导性、促进民族奋发向上的鼓动性及推动目标实现的高投资性。例如，日本在2001年推出了“21世纪COE(Center of Excellence, COE)计划”，这个计划投资11个学科群，之后又于2007年推出了“国际COE计划”(Global COE Program)，此次资助对象更加集中，资助强度增加；德国2004年初实施的“精英大学计划”(Excellence Initiative)总经费达19亿欧元，时间跨度从2006持续到2011年，该计划将竞争机制引入高校，在德国高等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韩国有“智慧韩国21工程”(Brain Korea 21, BK21)，涵盖四大前沿学术领域，在第一阶段周期(1999—2005年)7年中投资1.34万亿韩元(约12亿美元)，旨在有重点地把部分高校建设成为一流水平的研究生院和地方优秀大学；英国从1986年起至2001年进行了5次影响研究经费拨款的高等教育评估，且一次比一次完善，确实给大学注入了强大的压力和动力^{[9]105-126}。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除了1995年推出的“211”工程重点投资建设以外，于1998年宣布国家“985”工程重点投资建设计划，有效地促进了重点大学人才培养和科研水平的提升。此外，在学习“美国模式”中，香港科技大学就是一个成功典型。

(五)期待“中国模式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成功

近年来，有关“中国模式”(还有称“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案例”等)的讨论已从经济领域逐步扩展到了政治、文化、教育等领域，就是说，确实有可能存在“中国模式一流大学”的建设问题，进一步说，能不能像经济发展创造出一种独特模式一样，中国在一流大学建设上也创造出一种独特模式并使成功？实际上，虽然目前看来这种模式仅是“萌芽”或“雏形”，并且也未被国际认可，但它确实值得中国政府和人民思考、探索和努力。对这个问题的系统性回答，着实考验着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智慧、勇气和胆略。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如果说，我国在经济领域进行大胆探索，创造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使全体人民在物质财富上得到了极大的丰富，

① 资料来源: The Carnegie Classification of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1994, 2000, 2005 Education.

那么,在教育领域创造出成功的一流大学模式,我们就不仅可使中国在知识创造领域取得进步,而且将使中国人民的精神境界得到极大的提升。事实上,冷静又理性的人们认识到,要使中国一流大学建设事业取得圆满成功,不仅需要大学自身的艰苦努力,更重要的是需要外部力量的大力支持,特别是与政治体制改革密切相关的大学制度改革。对此,不少学者包括大学校长都建议采取“渐进式改革”较为稳妥。如南京大学陈骏校长的建议就很有建设性、代表性。他说:“作为一个大学校长,首先要形成一个目标管理。一个学校希望达到什么目标,朝什么方向走,让所有师生员工清楚。第二步是理念管理,要自上到下清楚。第三步是文化管理,有什么样的传统文化,要打造什么样的新文化,用文化创造凝聚力、激情与理想。最后阶段才来做制度管理。体制改革应该放到最后,其他都成熟了以后再回来改变它。它是上层建筑。我希望走从上到下的改革模式。我们现在还早呢,目前还在第一和第二个阶段,……下一步要集中智慧,把很多理念搞清楚,形成共识。”他还说:“除了大楼和大师以外,这四个软实力,是一所大学战略管理的起点和竞争力所在。可以这样理解,理念创造文化,文化创造制度,制度创造生产力,循序渐进。目前最重要的就是从上到下进行目标管理,即我们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11]实际上,教育部2002年起连续举办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可以说就是“一流大学中国行动案例”。这三届论坛秉承“启迪领导智慧,憧憬大学未来”的宗旨,中外校长“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共同关注世界和中国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积极参与论坛的各个环节,充分发挥主体作用,整个论坛碰撞着探索者的思想火花,闪烁着大学领导人的智慧之光。”^{[12]36-37}论坛明确宣示了中国创建一流大学的决心、意志和力量。于此,需要提醒人们,这一切均发生在中华文明诞生的国度里,而且“从未有过”。可以说,中国教育领域正在发生的这些大事和喜事,就像我们奥运会的举办和神舟飞天一样,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中华文明背景中“中国模式”建设之道

日本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1834—1901)指出:“文明之为物,至大至重,社会上的一切事物,无一不是以文明为目标的。”^{[13]30-31}21世纪,拥有13亿多人

口资源的中国,在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成功发展的基础上,应当站在更加宏大高远的视角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作为弘扬中华文明伟大事业的一项重要任务。这不仅是我国教育包括高等教育整体战略推进的必需内涵,而且是提升我们中华文明国际地位的一项标志性工程。

(一)“和而不同”的建设理念

和而不同,是中华文明的基本精神。《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和而不同”的意义在于:“和”即“共存”,“不同”即“差异”;“和”是“不同”前提下的“和”;“不同”是“和”的基础;“和”与“不同”相互依存,辩证互动。坚持这个精神原理,一方面要学习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基本原理,借鉴和吸收其“同”,使自己获得“和”的条件和资本,另一方面,要在强化“和”基础的过程中讲究“不同”的策略,使我们的“不同”充满“中国特色”,显示中华文明特别是儒家文明的精神魅力。这里包含的意义有:一是通过学习借鉴以增强我们的建设能力和基本素质,二是通过吸收优势以增强我们与世界一流大学“共存”的理论基础。在目前形势下,我们既要建设“和”的基础,也要探索“不同”的途径和方法,使“和”与“不同”相得益彰、互有促进,以使“中国模式世界一流大学”获得学理基础。从这个角度看,全球世界一流大学不仅有统一性,也存在着多样性,可以有各种建设模式。历史上如此,未来何不如此?世界一流大学孕育于多种文明或多种文化之中,从多种文明中获得营养和滋补并发展壮大,形成符合人类特性和人类需求的基本模式。我们知道,历史上,作为中国儒家文明“卫星文明”^①的“日本文明”也诞生过世界一流大学。如上海交大2007年公布的世界大学学术排行榜显示,日本有1所进入世界前20名。应当说,这是东亚儒家文明的一大成就和贡献。它昭示,世界是多样、多彩、多元的,我们不必追求发展模式的统一性,而只求发展原理的统一性。为此,我们应以“和而不同”的精神理念积极参与到实现世界一流大学发展模式多元化建设目标的历史进程中去。

(二)“科学发展”的建设指针

儒家以民为本,源远流长。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是儒家的一个重要思想,也是中华文明的核心理念。意思是说,人民居首位,国家其次,君在最后。轻重主次关系很清楚,国家政治一切

^① [英]阿诺德·汤因比指出:“中国文明作为一方,朝鲜文明、日本文明、越南文明作为另一方,这两方面之间存在着十分紧密的关系。后三个文明受到中国文明的启发,但它们沿着自己的路线发展了从中国文明借来的东西,这足以将它们明显地列入次一级的分支文明当中,我们可以将它们称为(‘中国文明’)的‘卫星’文明。”参见[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插图本)》,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50页。

以民为本。当今社会,国家强调的“科学发展”,是指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并在发展中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做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际上,这是中华文明特别是儒家民本思想在当代的重要体现。研究表明,中国离当今世界一流大学的水平和境界还有很长一段距离,这是不容回避的事实。但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之路。首先,要努力使中国一流大学建设不断地“耦合”中国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或历史阶段,不仅要保持大学内部各要素的和谐、健康发展,而且要与国家的政治、经济、教育、科技等发展水平相适应或相协调;二是中国一流大学建设要坚持为中华文明和国家长远发展战略目标服务,即中国和中华文明的未来战略目标就是中国一流大学建设的主要内涵;三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要树立坚定的信心和勇气,以“超越性思维”构建真正属于中华文明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特色,一方面要使“中国特色”获得更大的成功,另一方面要积极主动地为世界高等教育事业做出特色性贡献。简言之,中国一流大学建设,应是深深扎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土壤,在稳步推进基础教育与大众化教育前提下,科学契合中国经济社会生态发展阶段,引领中国国家生态发展,提升中华民族的精神境界,弘扬21世纪中华文明的一流大学建设。唯此,中国一流大学建设,才是真正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一流大学建设,才是有中国特色的一流大学建设^[14]。

(三)“人民满意”的建设动力

《大学》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这句话揭示了民本思想及其贯彻民本思想的途径和方法。哲学家冯友兰(1895—1990)说得好:“中国的儒家,并不注重为知识而求知识,主要的在求理想的生活。”^{[15]95}换言之,在中华文明中,做到让“人民满意”,首要的是让人民获得“理想的生活”,而“理想的生活”无非就是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两个方面。显然,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不仅应弘扬明德新民、奋发向上、止于至善的民族精神,同时也应使人民得到实惠。具体说,一是表现在一流大学培养精英人才上,就是使国家得到长治久安的栋梁人才,全体人民能得到“引路人”;二是表现在一流大学将引导各种教育追求卓越、超越自我,从而有利于各类教育的成功。然而,世界一流大学客观上只能培养少数精英人才,而国家富强更多的是要依靠基层受过成功教育的人民大众。就是说,中国一流大学

建设必须是全面和谐的、是能改善人民生活的,最终令人民满意的。“人民满意的教育”应是对全体人民的教育公平、教育效率的贯彻落实及不断加强的基础教育、中等教育乃至大众化高等教育,并在此基础上建成一流大学。为什么这样说?实际上,虽然改革开放使我国经济社会取得了巨大进步,到2007年我国人均GDP达到了三千多美元,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人口多,底子薄,教育水平低”仍是我国的现实,特别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普通民众比例依然偏低,而占人口比例三分之二多的农村地区的教育基础条件还很薄弱。令人担忧的是,近年来有关“名牌大学里面农村孩子的比重连年下降”^①及不少学生放弃国内高考等消息常有报道,这应当引起各级政府、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警惕。总之,“人民满意”应成为我国推动一流大学建设的根源动力与源头活水。

(四)“特色发展”的建设内涵

儒家文明社会有“大一统”的历史文化传统。在这种文化传统中,“特色发展”喊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众所周知,2004年北京大学推行改革以后,曾引来一浪高过一浪的辩论。著名学者丁学良在肯定北大改革方向的同时也尖锐地指出:“北大的管理领导体制拿到国际上相比的话,很难入流,因为世界主流大学里面根本没有这样的架构。……那不是量的差别,是质的差别。”^{[16]194}华裔菲尔茨奖得主、哈佛大学丘成桐教授也指出:“现在的中国大学是由官员和院士管理,整个大学受到他们的管制”,他认为这种管理体制不利于创建一流大学^[17]。中肯地说,这两位学者的评论各有道理,但这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中国大学(如北大)是有特色的或者说与国外不同;二是中国大学需要向国际“看齐”,特别是在大学管理制度上需要改革。那么,我们是继续强化这种制度,还是大胆改革这种制度?这就是一个“特色建设”问题。“特色建设”的检验标准,应是能否促进中国大学的发展特别是科研实力的增强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实际上,当代中国大学的特色发展之所以艰难,不仅有体制内的原因,也有体制外的原因。体制外,是指国家政治、经济等宏观体制的影响,包括国家赋予大学行政级别等,都在强化大学的统一性;体制内,是指大学内各种非学术因素加强了行政化倾向,越来越归顺于统一行政模式。于是,中国大学难以“松开手脚”、“放手发展”,“特色化”大多停留在口头上或理想中。那么,如何才能开辟新局?

① 纪校长在谈到高校招生权利的问题时指出,“……现在有一种说法,好像大学生里面农村的孩子比重很高,其实是不对的。农村的孩子还是比重占一半,但是名牌大学里面农村孩子的比重连年下降。”(2009-03-07)[2009-07-29],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http://www.jyb.cn/high/gdjyxw/200903/t20090307_252546_2.html.

第一,鉴于大学深厚的历史传统及中国国情特色,建议国家在保持适度的“负责任的权威控制”的前提下坚持以法治校,即依据《高等教育法》等法规让各大学制定《大学宪章》,国家只管宏观而不管微观;第二,建议“抓小放大”,即对全国重点大学推行以自律为主的“可控式自治管理制度”,支持其谋划特色性发展,如革新人才培养模式等,而对非重点大学实行“规范式管理制度”;第三,就像允许深圳等实行特区政策一样,国家对条件成熟的大学和新办大学(如南方科技大学等)允许其大胆试验中国式自治管理制度,待成功后再作推广。

(五)“内涵发展”的建设重点

海纳百川,兼容并蓄,内涵丰富,是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涵。但是,我们可以说,“内涵单一”或“内涵不足”,是当前中国大学乃至重点大学建设的主要弊端或关键问题,其中包括制度建设、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这对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构成了严重的障碍,因为在这样的情势下,“建设一流大学”就容易成为一种口号,而无实质的内容,长此以往,不仅会造成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终极失败,而且会造成世界高等教育界对中国大学政策的“不信”。那么,“中国模式”的内涵如何建设?原则上,要把握好以下几点。第一,确立目标,创新前进,把一切不利于内涵发展的障碍加以扫除。首先,宏观上采取更加自信、开放的大学管理政策;其次,微观上以宽松自由的政策吸引具有国际水平的各类优秀人才到大学任职。有些政策虽不能一步到位,但可“慢步到位”,就是说,要通过“政策推进”不断累积人们的自信心、自豪感、荣誉感。第二,要重视哲学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鼓励和支持重点大学尤其是一流大学拿起理性工具来评判一切、建构一切、建设一切。只有这样,来自中国学者的“理论”才可能具有人类价值或全球性价值,才有可能凸显“中国级贡献”。因为,作为具备知识探索本性的一流文化机构,重点大学是一个国家的“知识储备场”、“人才储备场”、“学术创新场”,“精神设计场”,一个国家的精神境界有多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重点大学特别是一流大学的学术水平有多高。第三,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在学术上要克服“以眼前实践来检验学术”的标准,特别是在自然科学领域要鼓励和支持重点大学“仰望星空”,思考未来,专注于那些对人类有巨大贡献的重大问题或课题。实际上,不少诺贝尔奖获得者研究的问题或课题,有很多对当时的人类来说,都是“不管用的”,但恰恰是当时的“不管用”给后来的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21世纪,要使中国研究走在世界前列,我们千万不能局限于研

究“当前管用的”实践性课题,而要扩大视野,提升雄心,努力走进全球尖端研究领域。

(六)“借鉴发展”的建设捷径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是中华文明倡导的一个精神理念。毛泽东也说:“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18][24]}我们认识到,现代大学直接起源于西方文明,当今世界一流大学也是西方居多。在此形势下,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必须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建设经验。为此,首先,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进取,准确把握西方一流大学的历史特点与发展趋势,努力推进“中国模式”建设;其次,跟踪研究发达国家一流大学的战略发展态势和策略性选择,取长补短,补学补差,夯实中国一流大学特色建设的基础和条件;第三,坚决破除阻碍知识进步、学术研究、英才教育、社会服务的各种体制性因素,如努力将高校管理体制“去行政化”、“去官僚化”,敢于破除“官员文化”在大学中的不良影响。近年来,北京大学实行的改革方案就是借鉴美国一流大学的积极做法,准确地说,是直接瞄准哈佛、斯坦福、耶鲁、芝加哥等国际一流研究型大学模式“走路”:先“形似”,再“神似”,后“自我化”。应该说,北京大学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果,至少形成了一种创新理念和氛围,这种理念和氛围,不仅吸引了不少海外专家学者加盟北大、支持北大,而且带来了全国大学的思想解放和“政策跟进”。第四,要坚持从更广阔的视野、以更深刻的哲理、以更高的境界来看待“中国模式”的各项建设,也就是要从弘扬伟大的中华文明包括儒家大学之道的角度来看待和对待“中国模式”的理念、形式、特色等方面的建设。如果说,国学大师季羨林先生的预言即“21世纪,三十年河西的西方文化就将逐步让位于三十年河东的东方文化,人类文化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时期”^[19]是有根据的话,那么,这句话里也包含着一个“待检验的真理”,这就是,中国世界一流大学的诞生和发展,将是21世纪全球“人类文明之林”激烈竞争中内含的最重要的“中国大学现象”。这个现象必须引起中国各个方面的高度关注。

[参 考 文 献]

- [1] 阿诺德·汤因比. 历史研究(插图本)[M]. 刘北成, 郭小凌译,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5.
- [2] 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 周琪, 刘绯, 张立平, 王圆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9.
- [3] 欧文·拉兹洛. 多种文化的星球[M]. 戴侃, 辛未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 [4] 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 大学的兴起[M]. 王建妮译,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7.

- [5] 瓦尔特·吕埃格 主编. 欧洲大学史(第一卷)·中世纪大学[M]. 张斌贤, 等, 译. 保定: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8.
- [6] 克拉克·克尔. 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M]. 王承绪 译,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 [7] 刘海峰. 研究型大学的历史与文化底蕴[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08(1): 41.
- [8] 埃里克·古尔德. 公司文化中的大学[M]. 吕博, 张鹿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9] 刘念才, 周玲 主编. 面向创新型国家的研究型大学建设研究[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 [10] Alan B Cobban. Universities in the Middle Ages [M].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1990.
- [11] 陈统奎. 世界一流大学之梦——对话南京大学校长陈骏[N]. (2009-06-20)[2009-07-29]. 南风窗网站, <http://www.nfcmag.com/articles/1545>.
- [12] 吴启迪. 在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闭幕式上的讲话[R]//中外大学校长论坛文集(第三集).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 [13] 福泽谕吉. 文明论概略[M]. 北京编译社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59.
- [14] 耿有权. 生态学视野中的世界一流大学体系建设[J]. 现代大学教育, 2009(2): 86-93.
- [15] 冯友兰. 哲学的精神[M].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 [16] 丁学良. 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 [17] 张胜波, 王丽霞. 丘成桐炮轰中国高等教育七大弊端称人文教育匮乏[N]. (2009-03-27)[2009-06-20] 来源: 南方日报网站, http://news.xinhuanet.com/edu/2009-03/27/content_11084398.htm.
- [18] 人民教育出版社 编. 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2.
- [19] 季羨林研究所 编. 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M].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6.

法国雷恩一大副校长 Jean-Jacques DURAND 教授 来我校访问

本刊讯 2010年3月23日, 法国雷恩一大副校长 Jean-Jacques DURAND 教授来我校经济管理学院访问, 徐康宁院长和校社科处副处长邱斌教授及陈淑梅教授等老师一起会见了法国客人。双方就“1+1 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项目、跨校间的教师合作科研项目、联合举办学术论坛、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项目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并达成初步合作意向。此前, 易红校长接见了雷恩一大代表团, 徐康宁院长、邱斌教授参加了会见。

法国名校雷恩一大是一所多学科国立综合性大学, 下设 15 个院系, 开设的专业主要分为工程技术、医学和人文科学(经济管理、法律和社会科学等)三大部分。该校教学实力雄厚, 尤其是经济管理和生物与环境科学等专业在法国高校有非常好的声誉。

ideology, involving the noumenon, psychology, realization and thinking system. The aesthetic perspective in the Song Dynasty focused on the internal reason and nature of things instead of on their external form and state. This adjustment brought about new aesthetic intentions and contribute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esthetics on the basis of idealist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 The pursuit of likeness in spirit declared the idealist philosophy parting from the Confucian classics and realizing the objective world with a new conception and in a new way, which became the foundation of the integration of idealist philosophy and aesthetics, and consequently formed a new aesthetic discourse.

(16) The folklore perspective of transmission of *Kunqu* opera

WANG Ting-xin • 87 •

The transmission of *Kunqu* opera has alway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its folk custom. *Kunqu* opera is suitable to perform among folks both in form and content. As folk notion and way are beneficial for its transmission, *Kunqu* should make good use of folk culture for its better location and greater transmission.

(17) A study on sequels of *The Peony Pavilion*

ZHAO Tian-wei • 91 •

The sequels of *The Peony Pavilion* are narrations on the marriage life of Du Liniang and Liu Mengmei in general. However, the main characters in Tang Xianzu's original work are drastically changed. The authors expressed their own ethical ideals by using the past to allude to the present. As a result, the keynote of *The Peony Pavilion* is changed from immortal, passionate love between men and women to ethical righteousness among loyalists, upright officials, and virtuous women. In this regard, those sequels can be seen as nothing more than propagandas of neo-Confucianism.

(18) A research on role system of Ming opera

YUAN Peng-fei • 95 •

New research shows that role in opera is actually evolved from the role in Song opera. A complete role system was established in *Nanxi*, a kind of local classical opera in South China while in Yuan opera the role is the mixture of different roles. In Ming opera, the most noteworthy point is the mixture of both role systems in Yuan opera and *Nanxi*. It is through this mixture that we find the laws of role development which reflec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rphological evolution of Chinese classical drama.

(19) An explanation of distribu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ancient stages in Shanxi in space vision

CAI Guo-zhen • 99 •

The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ancient opera stages in Shanxi is closely related to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local opera backgrou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raffic conditions. The dynasties of Yuan, Ming and Qing witnessed the distribution of stages from several places to certain regions and then to a larger band of area. The stages were widespread but uneven in different areas. In flat areas that enjoyed the economic prosperity and traffic facilities, different forms of opera were easy to be accepted, thus resulting in frequent change of stages; in contrast, in mountain areas where economy was backward and traffic was difficult, the influence of outside operas was relatively small, which consequently contributed to the preservation of ancient stages.

(20) The spirit of Buddhism salvation reflected in Yuan opera

XIE Bai-liang • 104 •

The Yuan opera is renowned for its great achievements in the first golden period of Chinese drama. In the Yuan opera, the spirit of Buddhism salvation and its influence cannot be ignored. By analyzing some representative works in this period, we can come to the following logical inference: in mortal life people are born with pains and cannot escape from wrong doing and punishment; it is only by relying on the infinitely merciful Buddha that human beings can expect to realize the ideal of salvation.

(21) A comparison of post-graduate training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Korea

XIE Xi-shun • 110 •

This article discusses and compares the difference and similarity of graduate edu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Korea. By analyzing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and present situ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systems in neighboring countries such as Korea and Japan, we can see clearly both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graduate education in these countries. Some reform proposals are also put forward in the article.

(22) Building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under background of human civilization — an analysis on “China model” construction based on Chinese civilization

GENG You-quan • 117 •

University as a cultural institution should be understood in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civilization, and be built as a part of national civilization strategy.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are a natural outcome of various early civilizations which “coupled” the ecological system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It is the interactiv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that successfully contributed to the “European model of world-class university” and to different countries' specific construction models. The “American model” as one of those models took the leading position around the 20th century. To build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China must seize the opportunity to promote “China model” characterized by Chinese civilization.

(23) National-defense education and its inspiration in Shan-Gan-Ning Border Region during Anti-Japanese War

LU Hua • 120 •

The outbreak of Anti-Japanese War mad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ut more emphasis on the role and effect of national-defense education. In order to win this national war of liberation, national defense was regarded as the major program and the relevant policies were made. National defense presented in the content of cultivating national spirit was carried out in the form of political mobilization and in the position of school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Border Region government, these policies and measure were put into effect, provid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great victory of Anti-Japanese War.